

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秋毫无犯

□ 郑学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防务。入城部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展现在北平市民眼前的是一支正义之师、文明之师、仁义之师。2月13日新华社报道：“人民解放军北平卫戍部队认真遵守城市政策和纪律，受到北平人民的交口称赞。”北平市委、人民政府及各人民团体赠送入城接防的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41军第121师“秋毫无犯，仁义之师”锦旗一面。

“约法八章”和“入城纪律十四条”

1948年12月初，平津战役刚打响，中央军委就考虑北平的接管问题了，制定了接管城市的政策。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于12月22日以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发布：本军奉命歼灭国民党匪军，解放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诸城市。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一、保护各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任何人不得破坏；五、除首要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机关官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本军一律不俘虏和逮捕；六、为确保城市治安、安定社会秩序，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本军部队及警务司令部或公安局投诚报到；七、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八、无论在本军进城前和进城后，城内一切市民及各界人士，均须共同负责，维护全城秩序，免遭破坏。凡保护有功者奖，阴谋破坏者罚。

12月28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签发了《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做好入城准备工作通告》，其附件规定了“入城纪律十四条”，细化了“约法八章”，如入城机关、部队人员必须佩戴符号，或持有证件，并遵守政策、纪律与规则；入城军人须注意军风纪律，服装整齐，注意礼节；通行时靠右边走，不准在市内乘马驱驰，汽车速度每小时不得超过40里，慎勿发生意外；不准私入民宅，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必须公平交易，遵守群众纪律；等等。

“约法八章”和“入城纪律十四条”

传达到接防部队的连、排、班，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并张贴于北平城区的大街小巷，告晓北平市民予以监督。

严格挑选接防部队

当年的新华社报道说：“故都北平成为人民的城市了。当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由西直门源源开入城内，当解放军的雄伟行列通过这一历史名城的主要街道时，受到了北平人民如醉若狂的欢迎。最先入城的部队中有曾受到通令嘉奖的“秋毫无犯团”及“守备英雄团”。

北平和平解放方案敲定后，平津前线司令部经过严格挑选，决定由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军纪严明的第41军担任北平的警备任务。第41军是由山东胶东太福山起义组建起来的部队，抗战时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胶东军区的主力部队。1945年10月，这支部队渡过渤海，开进东北，后被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4纵队。在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第4纵队第10师第28团（后改称第41军第121师第361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该军部队路过锦州老乡果园时，战士们强忍饥渴，无一人上前摘苹果吃。毛泽东闻知此事深有感慨，曾给予高度评价：“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

警备北平这座历史名城，对第41军来说是全新的考验。军党委决定由军政委莫文骅率领第121师率先入城接防，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进行入城资格评比，做好入城接防的各项准备工作。

“咱们人民的队伍”

1949年1月31日12时半，莫文骅政委率领接防部队官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北平。接防部队迅速在城内主要交通要道设岗布防。当天下午5时，电讯局的工人和北平10多所大学的学生4000余人，在中南海天坛寺为解放军指战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入城部队严格执行纪律，不扰民。当时正值严冬，寒风刺骨，滴水成冰。

战士们白天衣着单薄，夜里盖着一床薄被，住在市民居所的门道里、屋檐下，难以御寒。有的战士露宿街头，有的即使住在室内，由于没有糊窗户，也没有干草铺床，冻得不能入睡，他们就在地上跳跃、跑步取暖。附近的市民见战士们冷得不能入睡，便纷纷热情地请他们到家里取暖，但战士们坚持不进民房，不给群众添麻烦。据当年新华社报道说，某部二连八班刚入城时，在文津街一带担任流动警戒任务，当走到一所漂亮的楼房附近时，一个老乡告诉他们，这就是北平图书馆。战士们虽然事先没有得到命令，却主动在大门外露宿守护，没有一人进去，一直守到天明。驻在天坛寺的某部四连通信员张贵成，在厕所拾到一支金尖钢笔，立即上交给指导员。通过查找，钢笔的主人是傅作义部一个少尉排长，于是物归原主。这一拾金不昧的佳话立即传遍了留驻那里的傅作义部队。傅作义部军械科的唐科长，特地向所在的解放军某部营长表示敬佩之意，并想把自己的手枪送给他留作纪念，被营长谢绝了。唐科长又是给解放军腾房子，又要准备茶饭，也被营长婉言推却了。唐科长小声说：“你们怕犯纪律，我偷偷地送来好了。”营长认真地告诉他说：“我们遵守纪律是自觉的，人前人后都一样。”

新华社在报道中还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某部四连一排在一个药铺附近露营。药铺店主见状，出来请他们进房里休息，被战士们婉言谢绝了。店主又送来一锅热气腾腾的小米稀饭，让战士们吃了御寒，可战士们表示，谢谢老乡，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了晚上11点钟，寒风呼啸，战士们久久不能入睡。店主再次诚恳地请大家进房里取暖，战士们又一次谢绝了。凌晨3时，店主被战士们的精神所感动，真诚地说：“你们为人民服务，必须要有个健康的身体，现在已下了霜，你们要冻坏了！”战士们虽被店主的热情所感动，但是他们表示自己身强力壮不要紧的，最后还是坚决地谢绝了。

解放军官兵严守纪律的事迹在北平的大街小巷被迅速传颂着，市民们竖起大拇指，有人赞叹道：“天下怎么有这么好的队伍！这真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咱们人民的队伍。”

（摘自2019年9月1日《解放军报》，原标题为《70年前，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秋毫无犯》）

邓瑞甫：抢险救灾 奋勇前行

□ 周闻韬

邓瑞甫1934年出生于重庆市长寿区，1951年参加公安工作，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分局土生派出所民警、黄桷派出所指导员。

1981年夏，重庆地区遭遇特大洪水灾害。7月15日，洪水猛涨，洪峰淹没了大片房屋和庄稼，邓瑞甫的家眼看也要被洪水淹没，他断然选择“抢救群众财产要紧”，不顾自己严重感冒，赶到沿江一带查看水

情，维持交通秩序，组织群众转移。

当天夜里11时多，洪水继续猛涨，巡查中，邓瑞甫发现尖嘴地区的一处洪水围困了80多名群众，情况十分紧急，而现场仅有的4只橡皮船无法满足救援需要。邓瑞甫决定，立即带队去附近的农村借用木船。

午夜12时左右，邓瑞甫等人找到一只停在江边的小船，拨正船头，朝尖嘴地区奋力划去。16日凌晨1时10分，正当他们即将到达被困群众处时，只见江面上电弧光一闪，邓瑞

甫不幸在江面碰上高压电线，触电壮烈牺牲。

“现在是党和人民最需要我们的关键时刻，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要接受考验、带好头，为抗洪抢险作出贡献！”这是邓瑞甫出发前留给干警们最后的指示，而他也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这句誓言。

（摘自2019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



□ 陈启西

一封抗战家书里的

命，闽东工农游击队战士、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周墩独立营战士，参加了闽东苏区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闽东独立师奉命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北上抗日，全团1300多人。1938年2月14日，凌其昌随部队从闽东屏南出发，途经福建浦城、浙江开化等地，于同年3月下旬进入安徽境内。经屯溪到达新四军驻地泾县，再次整编，凌其昌被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五连任战士。

因为部队整编北上，行军匆忙，战士无法及时收到家里的来信。这是1939年7月27日，凌其昌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驻地首次收到家书后，给父亲的回信，时年24岁。从这封家书简单的字里行间，可以得知凌其昌对家人的深切挂念。逢逢国难当头，他发出了“为了国家，凡是有志之男儿都应起来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的怒吼。寥寥数语，让后人感受烈士的满腔爱国热忱，感受为国为家一往无前的豪情。

（摘自2019年10月14日《福建日报》，原标题为《“凡是有志之男儿都应起来奋斗”——读凌其昌烈士抗战家书》）

回忆我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日子

□ 范承祚

完成三分之二。这些天，同志们都非常辛苦劳累。经与谢胡同志车上商量：今天午饭后直到傍晚，不安排活动，大家好好睡个觉！”这几句了解下情、富有人情的讲话，真的说到随行人员的心中了。

午饭后，我亲眼看到同桌进餐的周总理登上楼梯，进了他的套间卧室。我也进屋适当休息。至于午睡，我自从在车上打了瞌睡后，头脑兴奋得很，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我推开面向亚得里亚海的卧室窗户，眺望大海。

正当我的紧张心情有所放松之际，忽见楼下花园台阶处走上几个人。我发现其中有穿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原来我们的总理不曾休息，而是在同阿方警卫及联络人员来到罗拉宾馆花园内散步聊天，接触群众去了。我赶忙下楼走近总理。

当晚，在霍查、谢胡等阿国领导人参加的罗拉党政机关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总理在同阿方主要领导人交谈的同时，又分别同出席宴会的当地反法西斯老战士、民间艺术家们广泛接触。活动结束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又不知疲倦地工作到深夜。

批评鼓励，诲人不倦

周总理的言行，一向“严”字当头。对人严，对己更严。我个人就曾领受过周总理的两次三次批评，有间接的，更有直接的。

这些批评使我毕生受益。1966年4月下旬，我在短期下放山西八个月后，提前调回北京，匆匆上阵，参加阿尔巴尼亚总理访华翻译工作。其

间，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办公室，我在一旁亲耳听到周总理打来电话。他批评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苏联东欧司负责同志在接待工作上有薄弱环节，并两次提及我在会谈和群众大会上翻译的缺点：为什么范承祚此次在讲外语时，表达不畅，显得吃力？我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时，只见他给谢胡（时任阿尔巴尼亚总理）“咬耳朵”，而拿不出阿文译稿来。面对周总理在电话中对我的“间接批评”，我深感愧疚。接电话的余湛同志（时任苏联东欧司司长）先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并检讨“接待国宾工作不力”“组织人员工作未做好”。他还在向周总理汇报中为我“解围”：小范去西山搞“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八个月，不曾有机会接触外文。周总理听了余司长这番话，了解了我一时翻译“吃力”的苦衷，并立即指示：今后，翻译干部和外语人员不管是下放基层，还是去“五七干校”，都要保证他们有学习、巩固外语的时间。

我也受过周总理当众的直接批评。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冬季，中方在全国政协礼堂为阿尔巴尼亚国庆举行庆祝会。出席这一活动的周总理会前在会客厅同阿大使罗博和阿访华代表团交谈时，提及我国自然气候每年有“两股风”：一曰冬春季来自戈壁、有时带有沙尘的西北风，一曰夏秋季的台风。周总理突然考我：“小范，台风来自哪里？”我竟未加思索地脱口回答：“台风来自台湾海峡。”对于我的回答，周总理颇不满意。他把脸一沉，面对在场的中阿人士说：我

们外交部的翻译啊，一不学历史，二不学地理。哪里有台风是来自台湾海峡的呢？它是来自南海的深海区域嘛！周总理的这一批评实际上又给我和在座的中方人员上了一节生动的气象、地理课。我不仅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还翻译给罗博大使等阿尔巴尼亚外宾。客人们看到我受批评、面红耳赤地翻译，也为我感到有点紧张。

周总理的批评点到为止，他接着话锋一转，又对在场的中阿人士说：“范承祚，我对他是了解的。他是我的老乡，平素工作积极、勤奋、负责，为人也比较诚实……”阿大使等听了周总理对我的鼓励后，频频点头。此时，庆祝会即将开始，大家高高兴兴地进入会场。

从周总理上次间接批评和这次直接批评中，我对照了自己在语言和知识方面的不足，并把这些语重心长的批评看成是扎实学习的一个动力。我将周总理的批评原原本本地登在外交部的《每日简报》上，让我的同行、同事们也不同程度的从中受益。

挑灯夜战，雷厉风行

1968年11月下旬的一个冬夜，朔风凛冽，寒气袭人。笔者位于北京三里屯东九楼住处传达室的电铃刚敲过第一响，一阵清脆的电话铃把传达员唤醒，我被从楼上叫来接电话。“哪一位啊？”我满以为是为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找我有事。“我是周恩来。”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苏北口音。“啊，总理！”我不由自主地攥紧了电话线，将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生怕听错一个字。“小范，我把你从被窝里提出来了

吧？”周总理这种幽默风趣的表达方式，使我感到既亲切，又羞愧。更多的是敬重——冬夜，我们年轻一辈在家睡觉，老一辈的同志还在工作。我从电话里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小范，你马上找一下韩叙（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让他和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事找你们商量。”

我们都领教过周总理这种雷厉风行、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韩叙同我不敢怠慢，第一时间乘车通过寂静、宽阔、明亮的长安街，很快到达西花厅。在这里，周总理同其下属挑灯夜战的又一个新的回合开始了……

平等待人，体贴入微

周总理关心人首先体现在平等待人上。他常说，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周总理的体贴入微更体现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如他在会见、宴请外宾时，都有译员的正式座位，一般安排在他左侧。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感受到了阵阵暖意。尤其令人倍感亲切和鼓舞的是：1964年春，周总理结束亚、非、欧14国访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报告会上，还专门把此行的主要译员冀朝铸（英语）、齐宗华（法语）、笔者（阿尔巴尼亚语）叫上演讲台，向万名听众介绍了我们三人。

1969年“五一”之夜，毛主席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新到任的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当中国最高领导层诸成员一字排开，准备合影时，现场其他人员迅即闪开。此时，我遇到了一个意想不

到的情况。毛主席突然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我心知肚明，却不敢回应。接着，毛主席又轻轻对我做了一个招手动作——示意我进入摄影行列。那一刻，我简直不知所措。细心睿智的周总理看到毛主席的动作，立即向我发话：“小范，进来照相，是主席让你进来的！”我应声遵从。闪光灯亮了几下，摄影记者完成了任务，宾主各自退场。

是夜无眠。我惦记着摄影时的一幕，更寄希望于明天见报时摄影记者已将这张重要图片中“左起第一人”剪掉。否则，该如何向本单位的同事们解释啊。没想到，我的“心神不定”早已被敬爱的周总理所识破，得到他的理解，乃至他亲自为我“解围”。

周总理从天安门城楼回到西花厅办公室后，担心外交部有关单位和人员不明“拍照事件”的个中经过而有非议，于是亲自拿起电话，告知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明天《人民日报》等各本报将在头版刊出一张毛主席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见阿尔巴尼亚新大使的图片，范承祚也在其中。周总理特别强调，是毛主席和他本人要我参加照相的，并嘱咐相关人员，见报后，如有人非议此事就照此解释……就这样，周总理又一次为我解了围。

“绵绵恩情，浩浩长歌。”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了。至今，我还常在梦中见到他。梦境是幻，幻境如真。他的崇高精神、伟人情怀、他的领袖风范、人格魅力，他的翩翩风度、笑貌音容，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摘自2013年第9期《秘书工作》，原标题为《绵绵恩情 浩浩长歌——回忆我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日子》）

